



草

在

本报

郭文

住房空置率数据，曾引发过无数争议，甘犁的团队打算在今年6月发布他们的调研结果。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一数据达到了20%以上。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5%至10%是空置率的合理区间，10%至20%是危险区，20%以上则说明商品房存在严重积压。

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商品房空置面积，当时的统计指标也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0%的警戒线，因指标定义和统计方法等存在争议，该数据被任志强为代表的部分市场声音指责为“儿戏”。有趣的是，争议的结果直接消灭了数据，2008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相关报告。

甘犁十分看好机构发布此项数据的影响：“目前，市场和政府已经足够开放，况且这只是一份学术报告。”其实，甘犁的自信至少还来源于两个没说的理由。

首先是对调研科学性的信心，比如调研采用随机抽查，在工作日、非工作日，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都去调查，如果五六次住户都不在，才认定空置，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另外，这其实早已不是机构第一次成为关注焦点。2011年8月，第一轮调查访问结束，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历时47天，足迹遍布25个省、80个市县、320个社区(村)，一共采集了8438户样本。调研的结果

有争议的数据

是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因为对资产、负债、收入、保险、就业、支付习惯等敏感家庭金融信息进行极其细致的描述，弥补了官方数据的空白，一炮而走红。

真正把机构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其在2012年12月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数据。报告称，2010年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0。然而次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在2003年为0.479，之后逐年连续上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其后几年逐步回落，到2010年降为0.481。

两份数据悬殊如此之大，究竟哪个更靠谱？除了社会、媒体关注，这一话题还成为各个学院统计课堂上的热门话题。其后，学者岳希明、李实发表《我们更应该相信谁的基尼系数？》，对甘犁的数据进行了全方位质疑，甘犁则回复《以公开科学的抽样调查揭示真实的中国》，力陈调研设计的科学性。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论坛上，网友“diba252”从学术外的视角来进行评价：“无论西南财经大学的结论是否准确，起码这是向着准确的一次靠拢。学者们敢于挑战权威，本身就是值得赞赏的。这体现了大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首先解决好统计数据的服务对象，才能更好地发挥数据的作用。”

会哭的访问员

世界的资产调查中属于最高水平。目前，芬兰能够达到10%，不过这是在国家立法规定不能拒访的前提下；在德国拒访率高达70%；而国家统计局根本就没有公布此数据。“拒访率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容易接受访问的人和经过努力才接受访问的人时间成本差异很大。拒访率越低意味着样本偏差越小。”

甘犁将成绩归功于学生访问员的优势。他们身上常常有一股倔劲，一次不同意就来第二次，不愿意入户就约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再聊。天津访问员张采薇在调研日记中记录，自己3次贴条留言被拒，最后通过打“亲情牌”才获得独居老人的认同，成功地入户访问。“财经院校的女生多，被拒之后有些人就直接哭了起来。要我是受访者也肯定没法拒绝。”甘犁笑着说。

除此以外，机构还建立了一套完整流程来控制质量。比如，每个出访员配备电脑，问卷采用输入的同时传回录音；比如，建立专门核实团队，专门核对录音和录入情况，出现差异时进行电话回访；比如，让访员成对出行，相互学习访问技巧，遇到问题合作解决。专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团队的国际视野，在美国得克萨斯任教的甘犁有机会从长期与美联储合作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取得真经”。团队成立之初，核心成员就专门赴美接受系统性培训，拿回材料接近200万字，内容涉及计算机系统使用、访问技巧、问卷和问题的阐释与理解、如何紧急救护等方面。

模式的“盲区”

来家公益性机构，调研基本数据全部公开，经费由政府资助。二类是像兰德一样的国家级“智库”，本身不专门做调研数据采集，通过承接联邦政府项目，并为其提供报告研究来获取收益。三类是像彭博一样的信息集成服务商，靠为企业提供金融市场历史数据、价格、交易信息、新闻等信息赚钱。

让甘犁觉得尴尬的是，按照当前国情，3条道路都不具备可复制性。首先，我国公开金融数据非常有限，还谈不上集成；如果做成纯粹的商业性企业，那么学生和数据来源都不可能任意使用；想做纯公益机构，校方资金有限，大规模的调研开支将变得不可持续。“目前，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调研数据方面做公益使用，靠帮企业做研究报告收入来补贴调研开支。”甘犁感慨，“对于机构目前要做哪些事我心里很清楚，但是3年之后走到哪一步却没法判断。”

“20年之后，你们搜集的数据和撰写的报告或许都已经过时了，但这个教育国人数据重要性、用数据说话的过程意义重大。”这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送给好友甘犁的鼓励。

这个背靠西南财经大学的公益性学术调研研究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明星团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在全国具代表性的家庭层面金融数据库。调研团队的构成由清一色的西南财大在校生组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背景。团队成长也顺风顺水，首期调研就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1000万元的慷慨援助，还通过人脉关系获得了来自央行的支持，在各地派出专员帮助团队与社区建立联系。

当然，争议也不少。最大的质疑还是来自于机构样本采集量和国家统计局的40万户仍有相当的差距。但从国际经验来看，8000多户样本对民间调研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美联储与芝加哥大学合作的美国消费金融调查，2007年之前25年的样本量为4000户，而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收入动态跟踪调查，2005年的样本量为5000户。甘犁一再强调，在严格随机抽样的前提下，抽样误差随样本量的增加以几何级数递减。简单来说，如果用8438户来推断总体均值，抽样误差约是总体标准差的1%，已经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总体情况。

算作积极回应，2013年9月开始的甘犁团队的第二次调研规模大大扩张。1600多人次经过158天的访问，共完成28228份样本。

除了样本量增加以外，还有一个数据也让甘犁颇为自豪。调研的“拒访率”从2011年的11.6%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的10.9%，这在全

眼下最让甘犁头疼的是缺钱。2013年调研规模扩大后，成本也跟着翻了一番，一场调研下来花掉2000多万元，平摊下来，每户调研开销达到700多元，远远高于市场类调研机构。尽管项目带来了名声，但受教经费的限制校方也不可能无限提供款项。近期，机构拉来了农业银行和汇付天下两大“金主”，暂时性地减轻了压力，不过，考虑到未来还要继续扩大样本容量、增加研发实力，目前的资金仍然杯水车薪。

除了资金方面困难重重，机构核心成员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个问题。调研是个系统工程，尽管两年才有一次大规模出访，但前期准备培训，事后发布报告，定时电话回访，调整方法、改进设计等工作都劳神费力。机构出名后，前来寻求商业合作的企业确实不少，他们普遍希望能借助团队为自己的产品做个专项调研。“农行和汇付天下之前也提到过想做定制化的产品，但目前我们的精力实在是很难满足。”资金和精力“掣肘”的背后，其实是模式的“盲区”。

在美国，目前有3类机构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在做类似的事。一类是包括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内的200



芝麻开门向哪边

齐平

虽然面临股市新一轮扩容，中国股民提到发新股就气不顺，可听说那个阿里就这么巴巴地跑到美国资本市场去喊“芝麻开门”了，又觉得肥水浇了外人田——这种纠结很像小说里说的：“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买股票是为了分享企业的未来发展，成功的前提是要有值得投资的标的。看到那么多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公司跑出去让别人分享红利，确实心有不甘。

不甘归不甘。这些在海外注册的“外资企业”本来就不是A股盘子里的菜，除非股民们以往强烈反对的国际板开了口子。而且不管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就怕插错地方。低头看看自己手中那些或变了脸或变了味的股票，哪个上市时不曾幸福如花儿般绽放？

也许更应该感到失落的是与这宗年内最大募资项目失之交臂的港交所。香港曾经是阿里巴巴最为心仪的上市首选地，却因为其“同股不同权”的双层股权架构与香港市场“一股一票”的原则相悖，两次被拒之门外。

说港交所不动心是假的。近日高盛给阿里巴巴的估值达到1050亿美元，成为全球互联网公司中仅次于谷歌和亚马逊的老三；而其此次赴美上市实际募资额可能达到150亿至200亿美元，打破由Facebook创下的美国科技股近年IPO纪录。看着腾讯在香港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情形，就知道香港资本市场对于高科技公司的渴求。

据说，港交所管理层最初也曾试图引入同股不同权制度，以避免变成阿里管理者口中的“沉舟”，但最终还是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原则”，“无意改变上市规则”。

这个原则，说到底还是尽力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使之免受任何可能的危害。轻易不对上市公司“芝麻开门”，只是为了避免打开伤害投资者的潘多拉之盒。

而美国股市虽然能够容忍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但对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也是“零容忍”。通过以披露为主的市场监管机制，加上成熟的机构投资者、集体诉讼文化强力组合，共同制衡“同股不同权”的负面影响，所以阿里赴美上市之路注定不会轻松。诚如马云在写给员工的内部邮件中说：“阿里巴巴这次在国际资本市场必将会因为规模、期待值、国际意识、文化冲突、区域政经……遭遇空前绝后的挑战和压力。”

“沪港通”渐行渐近，各方都在细细检视双方交易制度的接轨，而更应重视的，当是“投资者利益至高无上”的理念接轨。比如近日港交所出台了类似“预披露”的新规，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一旦不合规，相关各方就要受到“贴堂惩罚”、“点名羞辱”，被呼为“太苛刻”。但只有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苛刻，才能对中小投资者的爱护。成熟的股市，哪个不是对上市公司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亲不亲，故乡人。和许多赴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一样，阿里巴巴临行也向A股市场抛来一个媚眼：“未来条件允许，我们将积极参与回归国内资本市场，与国内投资者共同分享公司的成长。”这让人想起了中石油、中国平安等H股大佬的衣锦还乡，想起一些海外折戟的中概股的迷途知返，因为对于融资者来说，还是这里的股市最贴心、最温暖。

对我们的好公司到海外上市，不妨学学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洒脱道声祝福。只是海外资本市场不像我们这边宽容，类似一声不吭就把支付宝股权划走这样的毛病，“从此有都改了”吧。

本刊执行主编 刘涇
编辑 常艳军 陈果静
联系邮箱 jrbmlm@live.cn

温故

财富的极限

张 忱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意思很好懂：声色纷杂，令人眼花缭乱，而饫甘饜肥，令人舌不知味。和色声味一样，对财富的追求也应有个界限，苛求太过，必然适得其反。

明眼人看出的问题都是相似的。在5月初结束的2014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在股东问答环节重新阐释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我的生活，不会因为花更多的钱就变得更快乐。更多的财富和收入会使人变得不

同，但这有一个极限，一旦超越，更多的消费将与幸福负相关。也就是说，太有钱很可能导致不幸福。即使不像曹雪芹那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也会让幸福打折。

在投资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在应对财富方面也是。有的人能力圈更大，就能面对巨大财富应付裕如。比如巴菲特，如此富有，依然能保持清醒，不穷奢极欲——他的老搭档芒格评价他说：在个人事务方面，沃伦比我节省；也不给孩子们留太多的钱，几个

儿女都没有因其大富大贵。可也有人能力圈小些，动辄想7000万元嫁女什么的，就要尤其谨慎，一旦超出了自己的界限，更多的财富反而会成负担。

一个人能应对多少财富？这不是能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也难以用特定的工具来衡量。同样在这届股东大会上，有人向巴菲特提问，一个人该如何计算自己的能力圈？当即引来台下一片笑声。巴菲特回答说，我非常了解自己能力圈的边界，但对其他人实在

没有什么建议，每个人都有必要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不能说巴老又在打太极，这实在是个冷暖自知的事情，需要独处静思，细细体味，没有可以简单拿来的答案。

倒不是说人不应该去追求更多的财富，厌弃尘世，并非老子的本意，更不是巴老的初心。他们想要说的关键是，太多的财富会扰乱生活，过分的物欲能扭曲心灵，有了足够的对冲财富带来的负效应，才能保持安足闲适的生活，才更有幸福感可言。